

郑子瑜
《中国修辞学史稿》
问世十周年
纪念论文集

宗廷虎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问世 10 周年纪念论文集/宗
廷虎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7. 12
ISBN 7-80088-986-6

I. 郑… II. 宗… III. 汉语-修辞-文集 IV. H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8947 号

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

问世 10 周年纪念论文集

宗廷虎 主 编

责任编辑 孟 谦

中国社会出版社发行

北京西城区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北京顺义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850×1168¹/₃₂ 印张: 10 字数: 270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18.00 元

ISBN7-80088-986-6/C · 228

前 言

—

1995年是著名修辞学家、香港中文大学高级研究员郑子瑜教授80大寿，又值他的名著《中国修辞学史稿》问世10周年^①，为了表示纪念之忱，也为了希望国内的修辞学研究者能对中国修辞学史研究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总结，我萌发了主编这本纪念论文集的念头。

郭绍虞老师在《中国修辞学史稿·序》中指出：“子瑜教授是至今为止第一个研究中国修辞学的历史的学者，这书是第一本的中国修辞学史。”确实，在子瑜先生之前，探讨中国修辞学历史的学者虽有，但不够系统和深入。例如，胡光炜20年代发表在《国学丛刊》上的两篇修辞学史论文，实际上只写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徐梗生《修辞学教程》（1933）、章衣萍《修辞讲话》（1934）、陈介白《新著修辞学》（1936）等书中虽有修辞学史的专章，但都是参考了日本岛村泷太郎、五十岚力、佐佐政一著作中有关论述写成的，很少有自己的创见^②，而且也太简略。因此讲子瑜先生是第一个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的学者，是切合实际的。同时，如果说1965年在日本出版的子瑜先生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为第一本中国修辞学简史的话，《史稿》作为第一本系统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乃是完全不过分的。在《史稿》的影响和促进下，在短短七、八年间，中国学术界连续推出了3本修辞学通史和2本断代修辞学史。其中通史有周振甫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1991）以及我和李金苓的《汉语修辞学史纲》（1989）、袁晖和我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1990）。断代史有我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1990）和李运富、林定川的《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1992）。我和李金苓为了完成望道老师的遗愿，

从1979年开始探索“汉语修辞学史”这一课题,《史稿》的问世,使我们获益匪浅。我们认真学习了此书的观点、材料和研究方法;子瑜教授研究“史”的不断创新精神,也同时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正因为《史稿》和后出的修辞学史著作有着这样和那样的联系,因此我于1994年10月为这本纪念文集所写的《征稿启事》中指出:《史稿》“为中国修辞学史研究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它对开拓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新局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句话后来写进了我为《修辞学习》1995年第2期“纪念《中国修辞学史稿》问世10周年”专栏所写的“编者按”里。这不是凭空说的,它乃是我个人体会的结晶。

我主编这本纪念文集的又一宗旨是:希望它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对今后的修辞学史和修辞学研究,能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或提供一定的启示。据我所知,目前国内正有学者在总结20世纪我国修辞学研究的经验和规律,子瑜先生和我也正主编着《中国修辞学通史》5卷本(将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岁末出版)。同时,21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发展,也迫切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得到借鉴。这本集子如能提供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后研究的深入,是不无裨益的。

二

为此,我从多个角度拟了一个“参考选题”,向全国部分修辞学研究者寄发了数十封组稿信。有的朋友很快就惠寄了大作;有的朋友实在忙,但终于被我的组稿信、催稿信和讨论选题信(有的一个人就收到我四、五封信)“逼”出来了。这是友谊的象征,当然也含有对子瑜先生的敬重和钦佩之情。其中部分朋友确实忙得腾不出时间来写,最后婉言谢绝了约稿,我也深为理解。现在收入本书的论文,按约稿时的设想,由不同角度可以分成4组。第一组为总论,从宏观上论析子瑜先生对中国修辞学史和修辞学研究的贡献。第二组进行纵线评述,按朝代先后,分别论述《史稿》对先秦到现代的修辞论进行总结时,所作出的贡献。或者重

点评价《史稿》对某一朝代中某一代表性著作的论析。第三组为横断面评述，分别评论《史稿》对某一领域、某一角度、某一课题修辞学史研究上的贡献，如郑著对修辞学历史上有关口语修辞、语言风格、实用价值论、美辞论以及历史分期、修辞教学等多个方面所作的总结等。也有文章专门探索子瑜先生修辞学史研究不同阶段的演变和发展。第四组为散论，探讨的范围已超出了《史稿》的内容。如有的文章评论由子瑜先生发起探讨“语法修辞结合论是否行得通”引起的争鸣，有的展望子瑜先生建议的编写“修辞史”的研究，有的评论《郑子瑜墨缘录》，有的论析郑先生的《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等。这些课题虽非直接探讨修辞学史，但也均与修辞学史研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三

我们只要浏览一下本论文集作者的姓名，即可看出其中有着多位我国一流的、知名的修辞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修辞学界，以其高质量的论著，在繁星布满的修辞学天空中，各自占据了光耀的一席。他们之中不乏国家奖、省市级奖和第一、二届陈望道修辞学奖的获得者。我衷心地感谢这些朋友惠赐论文，为本书增添了光彩。特别要深深地感谢著名修辞学家、已故老友吴士文教授。近年来他与癌症病魔作殊死的斗争，经常卧床不起，但是他却熬住剧烈疼痛的折磨，挥笔成文，最早惠寄了稿件。由于此书出版上遇到了一些周折，从稿件编定到印刷成书耽搁一些时日，士文兄在寄出稿件一年多之后，从病榻上邮来了字迹扭曲的信，一看就知道是他忍住巨大痛楚，用颤抖的手写成的。信中说他病中多忘事，特地专函询问：依稀地记得一年前曾寄我一文，又似乎忘记寄了，并问论文集的出版进展如何了？收信后我不禁泫然！其实我早就复信告诉他稿件已经收到，病痛却使他淡忘了！信中说他成天挣扎在死亡线上，痛不欲生。但是这关切论文集出版的事实，不正是他满含生的希望的明证么？收入本书的士文兄所写的这篇论文，已成为他最后的遗著。又如音

韵学家、语言学家陈亚川教授是与我通信多年却又缘齐一面的朋友，他的文章寄来了两次。一次是认真抄写的手稿，过些日子又寄来了修改后的打印稿。未料数月前他也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未及看到本书的问世。纵览全书，作者中绝大多数是研究修辞学和语言学的，但也有文学理论研究者。复旦大学袁震宇教授是专治文学批评史的专家，他从不同视角为本书所写的论文值得重视。

从地区的分布看，本书的作者遍布全国各大行政区。有东北的，有西北和中南的，更有华北和华东（包括台湾）的。其中有中国修辞学会领导成员郑远汉、黎运汉教授等，也有大行政区和省修辞学会的负责人。尤其难得的是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则》研究专家蔡宗阳教授百忙中也惠寄了大作。

本论文集的作者涵盖了老、中、青三代，从年龄上看，由二十岁到七十多岁都有，可以代表不同年龄层次的修辞学研究者。老年作者多为修辞学界所熟悉，不必细说；中青年作者的富有生气的文章也值得一读。顺便一提的是青年作者中有几位正在复旦大学和其他学校攻读修辞学博士学位，他们有的已在修辞学界崭露头角，这本论文集为他们提供了向郑先生和全国修辞学者讨教的好机会。

这本书是我10年来为郑子瑜先生主编的第三本论文集。回忆80年代中期为子瑜先生编《名家论学——郑子瑜受聘复旦大学顾问教授纪念文集》^③时，还恍如昨日。后来又编了《郑子瑜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工作》^④。我是抱着既感激又崇敬的心情来编这几本论文集的。多年来，子瑜先生对复旦大学和我本人的修辞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和支持，使我铭记在心。现在，就让这3本书来记录子瑜先生和我的师友之谊吧！

与前两本论文集一样，我是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编选的，文责由作者自负。作者的观点，编者不一定全都同意；为了使不同的观点得以争鸣，才将所收到的文章都收入集子，也不改动它们的论点。

为了让我的博士生赵毅从子瑜先生和其他学者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我请他参加了本书的编辑工作。在清稿过程中，他认真

核对，改正了个别文章中的一些错字（可能是作者笔误所致），也作了一些删节。

最后，再一次向热情支持我工作的天南地北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宗廷虎

1997年1月31日于复旦大学四舍苦学斋

注：

①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的版权页上虽注明出版年月为1984年5月，但作者和读者看到此书的实际时间却是1984年底或1985年初。

② 参见拙著《中国现代修辞学史》第四章第九节“修辞学史研究的兴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1997年再版。

③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④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目 录

前言	宗廷虎 (1)
郑子瑜和中国修辞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吴士文 (1)
郑子瑜先生和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	濮 侃 (10)
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学术倾向与前沿课题 ——纪念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出版 10 周年	姚亚平 (19)
《中国修辞学史稿》给我的启示	黎运汉 (29)
郑子瑜和陈望道	宗廷虎 (36)
科学的态度 巨大的启发 ——读《史稿》先秦修辞论	郑颐寿 (43)
体实达旨 辞以足用 ——子瑜先生论儒家修辞思想之我见	秦旭卿 唐朝阁 (53)
试论孔子修辞观的双重标准	赵 毅 (65)
读《〈史通〉论华约、辞格及其它》	宋远凌 (73)
郑子瑜评述《苕溪渔隐丛话》的修辞论	冯广艺 (79)
郑子瑜先生论陈骥《文则》探析	蔡宗阳 (88)
精选细评出新意 ——谈郑子瑜评述《诗人玉屑》的修辞论	戴婉莹 (99)
中国修辞学史成功探索的先驱	

——读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的几点感想

..... 袁震宇 (108)

杨慎修辞论浅谈

——纪念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的出版

..... 骆小所 (114)

论清词论中的修辞思想

——纪念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出版10周年

..... 谭汝为 (121)

简谈《中国修辞学史稿》的“楔子”和“小结”

..... 王培基 (133)

《中国修辞学史稿》“绪议”和“结议”重要论点

试析 孟建安 (144)

一部注重口语修辞的修辞学史

——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读后 谭德姿 (155)

郑子瑜论修辞的实用价值和规范 张炼强 (167)

浅谈《中国修辞学史稿》的风格论 张德明 (176)

郑子瑜美辞观述评

——纪念《中国修辞学史稿》问世10周年 陆稼祥 (186)

关于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及各个时期

研究成就的估价问题

——读郑子瑜先生《中国修辞学史稿》有感 ... 吴礼权 (199)

由陈望道先生以郑著《中国修辞学的变迁》

为研究生的参考书说起 林兴仁 (212)

从《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到《中国修辞学史

稿》 张雪涛 (221)

拓新·审慎·严谨

——从《中国修辞学史稿》到《中国修辞

学史》的修订 **陈亚川** (235)

目 录

《史稿》与我的修辞教学·····	倪祥和 (244)
从子瑜先生治学谈进一步探讨语修结合问题 ·····	林文金 (252)
语法修辞结合论和消极修辞	
——从郑子瑜对两部学术著作的评论谈起 ·····	谭永祥 (259)
郑子瑜论郭绍虞的修辞观	
——兼及语法修辞结合论点滴 ·····	刘增寿 (268)
汉语修辞史编写刍议	
——纪念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问世 10 周年	
·····	袁 晖 (274)
关于汉语修辞史的研究 ·····	郑远汉 (283)
名家论郑子瑜的修辞学研究举隅 ·····	彭嘉强 (290)
言人之所不敢言	
——学习《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	
中韩愈文部分的一些体会 ·····	邹光椿 (296)

郑子瑜和中国修辞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吴士文*

郑子瑜教授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的中国修辞学史家。他的治学，他的奖掖后进，他的为修辞事业而奔波的精神，都令我敬佩不已。

我们自从1985年6月8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我国首次语体学学术讨论会上认识后，交往是比较密切的。我们间的书信来往差不多近30封，他远道邮来的书，在我就有6本之多。他送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现在问世10周年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这部《史稿》一问世，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的重视，而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子瑜教授是迄今为止第一个研究中国修辞学的历史的学者；此书是第一本中国修辞学史”；“此书为中国修辞学史研究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史稿》的成功是多方面的”；“《史稿》博采古今成论，不乏独到见解”，实事求是，评论公允”；“业已达到了汉语修辞学史研究上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学术上的评论，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我要补充的是，《史稿》除在学术上的贡献外，还有在思想上给人以启示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更加了不起的。两种了不起的贡献合起来才是《史稿》全面的贡献。

第一，《史稿》开阔了修辞学研究者的视野，增强了中国修辞学者的自豪感。中国此前没有写出“中国修辞学史”来，决非中

* 吴士文，辽宁丹东师专教授，中国修辞学会顾问，已故。

国没有修辞学的资料，只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特别是一个讲究修辞的古国，一些文论、随笔、杂记、诗话、曲话、经解浩如烟海，它们蕴藏着的修辞理论，一个人 10 辈子也发掘不尽，利用不完。别说可以写出上千万字的中国修辞学通史，就是上万万字的中国修辞通史也可以端出来。听说吉林教育出版社将要印行郑子瑜、宗廷虎两先生主编的 5 卷本《中国修辞学通史》。恐怕所有国家的修辞学通史，都会在这 5 卷本的《中国修辞学通史》面前黯然失色。仅这一点，也足以使我们自豪的了。

第二，《史稿》促进了中国修辞学、修辞学史的繁荣。易蒲、李金苓说得好：“修辞学的繁荣，迫切需要修辞学史的繁荣。而修辞学史的繁荣，反过来又将给修辞学以很大的推动。”在《史稿》的带动下，一批修辞学史著作相继问世。如易蒲、李金苓的《汉语修辞学史纲》，袁晖、宗廷虎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史》，宗廷虎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李运富、林定川《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等。随着修辞学史的繁荣，1990 年以后，修辞学又开始了新的繁荣。从数量上看，1990~1994 年出版的修辞新著仅就朋友们赠送的就有 60 本之多；从质量上看我认为有不在少数的专著超过 80 年代的水平。论专题的，有王培基的《修辞学专题研究》，林兴仁的《广播语言艺术》；教材有倪宝元主编的《大学修辞》，张静主编的《修辞学教程》；理论方面的有王希杰的《修辞学新论》，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论修改的有倪宝元的《汉语修辞新篇章》；修辞方式方面的有谭永祥的《汉语修辞美学》；论整体性修辞的有刘焕辉的《修辞学纲要》；论修辞运用的有濮侃、庞蔚群、齐沪扬的《语言运用新论》；论古代修辞的有李维琦的《古汉语同义修辞》；论变异修辞的有叶国泉、罗康宁的《语言变异艺术》，冯广艺的《变异修辞学》；论风格的有张德明的《语言风格学》，郑远汉的《言语风格学》；论文艺修辞的有郑颐寿主编的《文艺修辞学》；论公关修辞的有黎远汉主编的《公共关系语言学》；论诗歌修辞的有谭汝为的《古典诗歌的修辞和语言问题》；还有为数众多的修辞学论文集，如《语法修辞论》、《语体论》等。这些，真是繁花似锦，使人目不暇接。这种

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固然和时代的大发展大繁荣息息相关，但也未尝不和修辞学史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推动有关。

第三，《史稿》树立了甘为学者之梯的榜样，它以先驱者的首创精神，为治中国修辞学史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产生了值得称道的积极影响。首先，它总结修辞学发展的内外关系方面为各种修辞学史的撰写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次，研究中国修辞学史最困难的是分期问题。但它在分期上却迈出了艰难的令人为之欣喜的第一步。它根据中国各朝各代修辞思想的发展的特点把修辞学史勾勒为7个时期。

- (一) 萌芽期——先秦时代。
- (二) 成熟期——两汉时代。
- (三) 发展期——魏晋南北朝。
- (四) 延续期——隋唐时代。
- (五) 再延续期——宋金元代。
- (六) 复古期——明清时代。
- (七) 科学期——现代。

这是在任何借鉴的情况下勾勒的。而且勾勒得比较符合实际。后来治史者有了这个借鉴，在分期上就会取《史稿》之所长。易蒲、李金苓的《汉语修辞学史纲》的分期，袁晖、宗廷虎主编的谭全基、戴婉莹、李金苓参编的《汉语修辞学史》的分期以及王希杰在《郑子瑜和中国修辞学史》一文中有关分期的设想，都是择《史稿》之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就是《史稿》为治修辞学史者奠定的良好基础之所在。

第四，《史稿》激励人们持之以恒地克服一切难关，掌握第一手材料。据子瑜先生自传和几位学者文中所载，他的学识多是在新加坡从事长时间繁重工作，过着非人的生活之余，靠坚持不懈，利用一切机会得来的。在日本他完成《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后，搜集中国修辞学史的资料，历10余年之久而不辍。2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他写成了他祖籍所没有的《史稿》。正如易蒲、李金苓所评说的：这部《史稿》远非《变迁》所能望其项背，已达到了汉语修辞学史研究上前所未有的高峰。我在想，以生活在那样

的坎坷环境成就了这样的修辞学史者，没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史稿》断难饮誉海内外，断难有20几位名家为之作肯定性的评论的。他在《自传》中说得极是：“我以为治学成效的关键在于‘决心’的有无，治学的方法只有‘有恒’二字。”子瑜先生的现身说法，堪为我们的楷模。这不是小小的经验，而是大大的经验。我们要像他那样奋斗，要和他共同奋斗，使中国修辞学、修辞学史较快较多地走向世界。

二

《史稿》问世后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语法修辞结合的讨论高潮。这场语法修辞结合问题的大讨论，起因和《史稿》中对语法修辞结合的论断有关。子瑜先生对他自己的论断经过认真地反思，有些疑虑。于是在1985年9月24日把这个疑虑化为《语法修辞结合论行得通吗？——给汉语语法学者的公开信》。《公开信》全文约2000字。

《公开信》一开头，子瑜先生说，他自己在很多场合请中国大陆学者们就郭绍虞先生所提倡的语法修辞结合论以及他自己所著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中为“结合论”所作的按语和评语发表高见。然而学者们对此或是“默而不答”，或是“不置一词”，或是“笑而不答”。据郑子瑜教授分析，有些学者“默而不答”或“不置一词”，或许因为未读《史稿》，所以“无可奉告”，但更可能是不同意的一种谦逊的表态；有些学者“笑而不答”，也许是不赞成的表示。

接着，子瑜先生说他自己根据上述情况和只有个别学者表态的事实，重读了《史稿》对结合论的按语和论断，认识到自己在《绪论》中“所提及的还算客观和虚心”；在现代篇第七节中“所提及的还算可以”；在现代篇《小结》中“所提的，只因郭绍虞先生一本书的出版，就证明语法修辞结合论的时代来临”，未免太武断了；在《结论》第六《语法与修辞的分与合》中所提的“汉语语法修辞结合论的时代总要到来，而且是已经到来了呢。”则是

“霸道”已极。

最后，子瑜先生说他很想《史稿》再版时对此作一些修改，希望更多的学者们参加讨论，发表意见。

我被他的执著地追求真理、不耻下问、胸怀坦荡和对历史对读者高度负责的至诚所感动，回信说明我对“结合”问题的看法，并表示愿为掀起一个讨论高潮而尽绵薄之力。征得子瑜教授同意，决定在即将出版的《语法修辞从刊》中发表《公开信》及子瑜先生邮给我的一些名家的回信。后《丛刊》因故没能问世。于是取得营口师专校长兼《学报》主编周元景的支持，决定先在《学报》上刊载各位名家的回信。周元景校长是搞语法修辞出身的。我们有一个共识，即一刊之力影响不足，便和《修辞学习》杂志联合发表“语法修辞结合问题笔谈会”的启事。从86年秋到91年末，来稿参加讨论的有百人以上。讨论时间长达5年之久，讨论者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参加人数之多，赞助经费之易，参加者从业之众，均为中国语言学史上所未曾有过的。

对结合问题持反对意见者约占1/2。虽说它没有达到统一的意见，但《公开信》却已深入人心，而且带来了几乎超过《史稿》本身的影响。人们一提起《公开信》就联想到《史稿》及其作者，一提起《史稿》及其作者就联想到《公开信》。因为《公开信》收到的效益是我们和子瑜先生始料之所不及的。一是它确实实地引起了一大批语言学者的认真思考，在学者们中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起到了“以文会友”的作用；二是它加强了语言的实用性，教学上的方便性，因为讨论的要求是结合实例，多数学者认为教学上把语法的某些知识和修辞的某些知识结合起来是个可行的办法；三是有些学者看到语法修辞在内容上存在着“共域”或“交叉”现象，研究它们可以把语修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边缘性的科学；四是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不管怎么研究，语法还是语法，修辞还是修辞，谁也取消不了谁；五是参与者都能心平气和，畅所欲言，不受框框的束缚，也没有人对“持不同意见者”说三道四。不管赞成结合或否定结合，都一视同仁，真正做到兼“收”并“发”。我认为这场大讨论正在或即将发挥它的重

大作用，而且时间越长，它所显示出来的作用越大。我甚至认为它的作用决不在 30 年代文法革新的那场大讨论之下。

现在为了进一步给语言学工作者提供研究上的方便，林文金、周元景两先生已经把近百篇的文章汇成一书交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董树人先生责编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语法修辞结合问题》^①，子瑜先生虽不是名义上的主编，但也应该说是他集天下的英才而在实际上主编了的一本力作。

三

子瑜先生为了中国修辞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在奖掖后进，培养青年，指导科研方面也是值得称道的。就我看到的材料，一是他给马鸣春先生的《人名修辞学》写序，序中盛赞该书是“创始性之作”；但也提出殷切的希望。他希望“宋以前谈论人名修辞现象的文字也加以引述和评鹭，使这部创始性的修辞学新著更加完善。”彭嘉强先生对郑先生奖掖后进的体会更深。他说：“我不仅亲聆子瑜先生的教诲，而且每次寄拙文去征求他的意见，先生总是很认真并十分善意地提出宝贵意见，有的还亲自动笔修改，并且十分谦虚反复强调仅供参考”。这说明了他们对学术的奉献是无私的，他要为培养更多的修辞人才做更多的努力。林兴仁先生过去是陈望老的研究生，他们在讨论会期间见过面，而郑先生回香港以后先写信给他，第一句就是“先生得望老之衣钵真传，成就卓著。”子瑜先生讲的不是溢美之辞。1994 年，陈望老修辞学基金奖评审委员会评选出得奖的 3 本书中就有林兴仁先生《广播语言艺术》。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对易蒲和李金苓的至诚态度。他们以前素不相识，也无特殊关系，只是因为子瑜先生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一篇《王充论修辞》，易蒲、李金苓除了肯定子瑜先生对王充的修辞论所持的观点外，还提出了子瑜先生将王充的论夸张辞与孟子的论夸张辞混为一谈。子瑜先生“极惊异于他们治学的勤谨，识见的高明，和眼光的敏锐”。子瑜先生闻过则喜，他们成了文字之交了。相识后，子瑜先生在为他们《汉语修辞史纲》所写“序”的

开头就写道：“听说李金苓女士、易蒲先生合著的《汉语修辞学史纲》已经脱稿，出版有期，使我觉得无限的欣慰。”他的欣慰，我想有分享朋友的成功的那种欣慰，但更重要的是他即将听到《汉语修辞学史纲》出师告捷的一片喝彩声。这一片喝采声果然到来了，国内外对《史纲》给予高度评价，而且从各个角度评价文章之多，可以说是举不胜举的。这已经不是奖掖，不是扶持，而是成了忘年的至交了。

他对于我也曾给予诸多奖掖。他1985年10月17日在给我的信中说：

在复旦时，时聆教诲，甚幸。近阅《语言教学与研究》月刊，读到大作，此似为郭绍虞《新探》出版后第一篇对结合论表示意见的文章。闻先生并将有专著（讨论语修结合的）出版，极愿先睹为快。寄上长函一封，请赐教言。

他1986年11月19日的信上说：您是稀有的对语法修辞结合论下过功夫作深入研究的学者，大函应该发表。兹复印夹上，请收。

子瑜先生的奖掖，我真的有些受宠若惊。我没有把我的回信和多位名家在一起发表，辜负了子瑜先生一片深情。这件事情想起来至今还深以为憾。但子瑜先生古道侠肠，他在《郑子瑜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工作》一书中却把我对《公开信》的复信发表了。如果不是这次写纪念子瑜先生的文章，我仍然发觉不了。

至于他被聘为复旦大学的顾问教授、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以及到各大学的讲学所受到的欢迎，都是出于对修辞学、对修辞学史情有独钟。他利用一切机会对青年学生传播修辞文化，进行治学教育，不辞辛苦。现在，他已经或正在为把《谢希德校长在授予郑子瑜先生顾问教授证书仪式上的讲演辞》中的希望之辞变成现实。这希望之辞就是“郑教授今后一定会加强指导，为我校办成国内第一流的修辞学研究基地献出大力！希望在郑教授的推动下，加强复旦与日本、欧美、澳洲、东南亚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学术交流”。